

DOI:10.14073/j.cnki.nywtj.2025.01.007

中泰建交 50 年：世纪关系的现代化 演进动力

周方冶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07)

摘要:中泰关系在过去的 50 年里,不仅逆转了此前百余年的震荡下行趋势,而且在持续上行过程中屡创新高,更进一步开启了共建“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泰关系之所以 U 型反转,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双方在“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文化结构”再平衡的现代化道路选择过程中,顺应“和平与发展”时代潮流,立足“求同存异”共识,共克时艰,共享发展,构建起政治互信、经济互利、社会文化互鉴的合作环境。时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泰关系也站上新的历史起点,开始携手开拓更具挑战性的后发国家现代化新境界。

关键词:中泰关系;命运共同体;现代化道路

中图分类号:D829.3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56(2025)01-0034-14

中泰建交 50 年来,两国关系始终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尤其是 2012 年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来,双边关系更是得到全方位深化发展。政治上,两国保持高层密切往来,而且相当重视地方层面的交往合作,特别是在两国邻近地区,泰方专门成立 3 个工作小组,即泰国—云南工作小组、泰国—广东工作小组和泰国—广西工作小组。此外,泰国还是所有外国在华设立使领馆最多的国家之一,除在北京的大使馆外,泰国还在中国设有 9 个总领事馆。经济上,中国从 2013 年起一直是泰国最大贸易伙伴,而泰国则是中国在东盟国家中第三大贸易伙伴;新冠疫情前,中国是泰国最大的旅游客源国,2019 年赴泰中国游客超过 1100 万人次,占赴泰外国游客总数近 3 成;中国对泰投资也呈现高增长态势。安全上,中泰军方联演联训有序开展,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也在持续提升。2022 年习近平主席访泰期间,两国发表《关于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并签署《关于中泰战略性合作共同行动计划(2022—2026)》及《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规划》,为新时期中泰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然而,1975 年中泰建交之前,两国关系曾在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中后期的百余年间,经历了从波峰到波谷的震荡下行,严重影响了正常的交流与沟通。那么,中泰关系在过去近两个世纪里之所以 U 型反转的原因与动力何在?路径是什么?本文将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选择视角出发,

收稿日期:2025-02-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 2023 年度重大招标项目“东南亚现代国家发展历史”(23VLS026)

作者简介:周方冶,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泰国研究所名誉所长,法学博士。

· 34 ·

对此加以分析与研判。

一、现代化转型对中泰关系的结构性影响

任何国家要长期保持系统稳定,都必须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三大结构的相互契合与动态平衡为前提条件,从而保证“生产—分配—消费—再生产”等环节的有序运作,并在此基础上妥善应对外源或内生的各类传统/非传统安全风险,否则就有可能陷入持续的动荡与衰退。对亚非拉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殖民主义的外部冲击从根本上瓦解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三大结构的传统平衡。为了摆脱系统性失序引发的螺旋式下行陷阱,各国就必须积极应对内外因素影响,推动从传统到现代的结构转型以促成“再平衡”(见图1)。在此过程中,后发国家的对外关系也将随之发生结构性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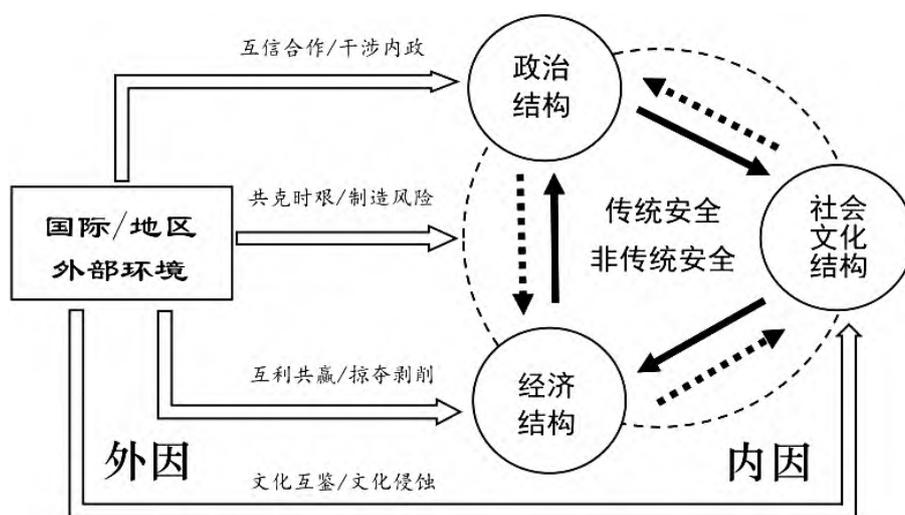


图1 后发现代化国家“再平衡”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影响国家间关系的核心要素是国家利益。这对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能否改善所处地缘环境,降低传统/非传统安全风险,从而为现代化转型提供保障;另一方面是能否为三大结构“再平衡”提供助力,从而加速现代化转型。从19世纪中叶起,中泰两国相继开启现代化转型,从而不仅对各自国内局势产生了结构性影响,引发持续动荡,而且对国家间关系也造成了根本性冲击。尽管中泰两国在现代化起步阶段选择了不同道路,导致双边关系在相当长时期内都处于震荡下行的非正常状态,但是双方在现代化道路选择上的内在相似性,却使得双方渐行渐近,从分歧走向协同,从而促成了双边关系U型反转。具体来看,其相似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 自主性

如图1所示,后发国家在推动三大结构“再平衡”的过程中,主要有两条路径:其一是图中黑色实线所示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被动式路径,即以因应外部环境影响力的经济结构转型为先导,顺应“生产力—生产关系”变化,推动政治结构的权力格局变更与体制变革,尤其是传统势力衰退与新兴势力崛起,并进一步促成社会文化结构调适,以契合“经济—政治”发展步调,达成三大结构的动态平衡。其二是图中黑色虚线所示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主动式路径,即以因应国际环境影响力的社会文化结构“超前”调适为先导,引领政治结构的新兴力量承担改良、改革甚至革

命重任,依托自上而下的国家体制机制变革与政策指引,推动经济结构“跨越式”发展,重建三大结构的动态平衡。

尽管从理论上讲,这两条路径都可以达成三大结构的“再平衡”,但是从历史经验来看,基本上所有跨越现代化门槛的后发国家都不会始终奉行单一路径,而是会审时度势地在两条路径中灵活切换,以更好适应内外因素变化,应对传统/非传统安全风险,持续提升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自主选择最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于19世纪中叶被动卷入西方主导的现代化浪潮,曾一度经受“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①的苦难历程。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再到以孙中山等为代表的革命派,近代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不断尝试各种救国方略,但都以失败告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才使中国找到最合适的现代化道路,并开始从现代化发展的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然而,对大多数亚非拉后发国家尤其是殖民地国家而言,自主选择现代化道路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都是奢望。因为,其内政外交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列强的操纵摆布,甚至在争取到民族独立后也很难完全摆脱前宗主国的持续性影响,从而严重损害了后发国家现代化道路选择的自主性与合理性。泰国作为东南亚唯一的非殖民地国家,其在现代化道路选择的问题上有着较高的自主性。这一方面得益于在现代化起步阶段,泰国^②地处英属缅甸与法属印度支那的地缘政治缓冲区,从而拥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另一方面则归功于曼谷王朝朱拉隆功改革,使得泰国能以更为自主的方式开启现代化转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主选择、顺势而为的“风中竹”^③外交传统。冷战中后期,中泰两国之所以能够跨越阵营鸿沟建交,很重要的就是泰国对现代化道路的自主性选择,从而能及时把握住中美关系改善带来的地缘政治机遇。

(二) 进取性

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亚非拉后发国家,现代化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遵循现实条件与客观规律,尤其是依托工业1.0到4.0的生产力跃升,经由三大结构一轮接一轮的递进式“再平衡”,从而实现螺旋式上升。

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串联式”现代化进程,中国式现代化依托“并联式”发展模式实现了“时空压缩”条件下的“弯道超车”,仅用数十年就完成了前者200多年的发展进程。但是,中国对现代化的认知与实践,同样经历了从“一化”到“二化”到“四化”,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再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分阶段递进的螺旋式上升。^④

然而,对大多数亚非拉后发国家尤其是殖民地国家而言,由于被动卷入美西方主导下的“中心—半边缘—边缘”全球分工模式,并被固化在边缘地带,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原料产地与制成品倾销地,因此通常在达成低层次“再平衡”后就很难再进一步突破生产力约束,开启新一轮的递进式“再平衡”。而泰国作为曾被一度誉为“亚洲四小虎”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却在自主选择现代化道路方面表现出强烈的进取性,相继通过国营工业化、民营化进口替代、外向型产业升级、全面自由化、“他信经济”政策、“充足经济”政策等持续开拓新发展路径,并在克服重重困难后跻身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冷战后,中泰双边关系在经济领域的深化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国在现代化道路上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14期,第5页。

② 泰国旧称“暹罗”,1939年更名“泰国”,1945年复名“暹罗”,1949年再次更名“泰国”并沿用至今。本文为便于论述,统称“泰国”。

③ A. Kislenco, “Bending with the Wind: The Continuity and Flexibility of Thai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Canada's Journal of Global Policy Analysis*, Vol. 57, No. 4, 2002, pp. 537-561.

④ 马敏:《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演进及前瞻》,《历史研究》2021年第6期,第21-24页。

共克时艰、共享发展的协同进取。

(三)本土性

对外源性的后发国家而言,现代化发展从一开始就深受全球/地区环境的外部因素影响。从积极方面来看,充沛的外来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等将为后发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提供重要支撑,从而弥补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式”发展所普遍面临的本土资源积累不足问题;而其他国家在现代化政治改革与社会文化创新领域的经验与教训,也将为后发国家的政治及社会文化转型提供借鉴,从而降低“试错成本”。但从消极方面来看,长期以来在发达国家主导下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也使得后发国家普遍处于政治上被干涉、经济上被剥削、社会文化上被侵蚀的不利地位,从而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受到严重阻碍,甚至是在发达国家打压下陷入动荡与衰退的螺旋式下行通道。

于是,如何在三大结构“再平衡”过程中,有效对冲外部因素的负面影响,也就成为决定现代化成败的关键所在。从亚非拉后发国家的成功实践来看,通过在“传统/现代”与“本土/外来”的关系中精准定位契合本国国情的社会文化组合,从而为政治转型与经济发展提供有效支撑,将有助于显著提升三大结构在“再平衡”过程中的系统容错与纠偏能力。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取得成功,很重要的就在于通过“两个结合”巩固了社会文化主体性,并在此基础上重塑了文化自信,从而有效对冲了外部因素的负面影响。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将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①

不过,对大多数亚非拉后发国家尤其是殖民地国家而言,殖民时代被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侵害与支配的历史记忆与殖民遗产,却使其在社会文化结构转型过程中很容易受“现代化=西方化”僵化观念的影响,并对本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当代适应性产生担忧与怀疑。而泰国也同样在是否“全盘西化”的道路选择上踌躇徘徊,直到20世纪中叶才确立起延续至今的“泰式民主”自主道路探索。^②中泰两国在现代化道路选择上对本土化的共同坚持,使得中泰友好的传统社会文化纽带得以延续与传承,并在两国建交后成为助推双边关系回暖的重要“催化剂”。

二、中泰关系衰退期(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 现代化道路的结构分歧

中泰传统关系曾在明清时期步入繁盛阶段。据《明实录》和《明史》记载,有明一朝,中泰一度交往密切。明朝在1370年至1482年间,曾先后22次遣使赴阿瑜陀耶王朝,而后者在1371年至1643年间,曾先后114次遣使来华,最多的甚至是1年6次。满清入主中原后,阿瑜陀耶王朝积极发展与清朝的朝贡关系,甚至在面临缅甸入侵压力时,还是于1664年至1766年间先后16次遣使来华。18世纪中后期,在历经缅甸入侵与阿瑜陀耶王朝覆灭的剧烈动荡后,随着吞武里王朝与曼谷王朝先后建立,泰国再次与清朝恢复密切交往。1782年至1852年间,曼谷王朝曾先后35次遣使来华,其中拉玛一世(1782—1809年在位)遣使15次,拉玛二世(1809—1824年在位)遣使9次,拉玛三世(1824—1851年在位)遣使9次,拉玛四世(1851—1868年在位)遣使2次。

不过,在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中后期的一个世纪左右时间,中泰关系却步入持续下行通道,并在冷战前期和中期落入冰点。究其原因,就在于朝贡体系下中泰传统关系的契合点已随着两国三大结构的运作体系瓦解而分崩离析。泰国传统的“王室—贵族政治结构/萨迪纳制经济结构/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18页。

^② 金勇:《以国王为元首的民主制:当代“泰式民主”的文化建构》,《东南亚研究》2018年第2期,第94—107页。

多元社会文化结构”开始让位于“王室—军人—文官政治结构/民族工商业经济结构/大泰族主义社会文化结构”，从而与中国走上了大相径庭的现代化道路，两国始终难以构建新的默契点，致使双边关系在结构性分歧下渐行渐远。具体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从地缘环境来看，中国无力承担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重任。

明清时期，中国作为东亚主导力量，曾在朝贡体系下长期发挥着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历史重任。但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国力在西方列强的蚕食鲸吞下开始持续衰退，尤其在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长达 13 年的国内大规模动荡与冲突后，无力继续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与此同时，泰国作为地处印太交界处的中南半岛枢纽国家，却正面临着西方列强觊觎。于是，主张“积极学习西方”的拉玛四世孟固王，选择接受了“主权平等”的民族国家观念，并于 19 世纪 50 年代开始事实上终止对清王朝的“朝贡”活动。对泰国而言，外交层面继续保持与清王朝的“朝贡”关系，不仅无法从后者借力抵御西方列强的殖民侵蚀，而且还会影响其借用西方话语的“主权平等”概念斡旋于列强之间，以维护其独立地位。^①

依托“风中竹”外交策略，泰国先是在西方列强环伺下成为东南亚唯一的非殖民地国家，而后在二战期间依附日本避免本土遭受战火蹂躏。冷战前期，泰国与美国结盟，“选边站”西方阵营，不仅积极参与朝鲜战争，^②并且主动成为越战前沿，从而换取了规模庞大的美国军事援助、无息贷款，以及各类基建和商业投资，为其从传统农业国到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关键性踏板。但是，泰国在地缘政治上“先亲日，后亲美”的站队举措，也使其与“先抗日，后抗美”的中国渐行渐远。

其次，从政治结构来看，泰国执政者不再需要对华关系提供合法性。

泰国传统政治结构是建立在“曼荼罗式”分封体制基础之上，因此在“王室—贵族”的权力博弈过程中，从阿瑜陀耶王朝到曼谷王朝的国王们都会借用朝贡体系下“天朝上国”的政治认可，为其提供合法性，从而对地方贵族形成法理性约束。^③ 不过，随着泰国在殖民主义冲击下开启现代化转型，政治结构也发生根本性改变。拉玛五世朱拉隆功（1868—1910 年在位）改革后，泰国从分封体制转变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体制，曾拥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贵族在“废藩置县”后被扫进历史垃圾堆，取而代之的是更为专业化的“军人”与“文官”政治集团。^④ 这就使得曼谷王朝的国王们不仅不再需要朝贡体系为其提供外源性的政治合法性，反而担忧外源性的“非对称”关系可能影响其在主权国家概念下拥有的内生性权威，因此对延续中泰传统关系不再感兴趣。

随着 1912 年中国清帝退位，以及 1932 年泰国民主革命，两国曾一度在传统时代终结的转折关口拥有过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正常外交关系的短暂“窗口期”，但一方面是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持续政治乱局，根本无力推动对泰外交，另一方面是泰国在开启君主立宪体制后，陷入右翼军人集团、左翼文官集团以及王室—保皇派的持续冲突中，并在军人集团掌握了政治主导权后，开始转向“大泰族主义”立场以提升其合法性，根本无意改善对华关系。^⑤ 尽管在二战结束后，随着泰国左翼文官

① Patrick Jory, “Siam as a ‘Tributary State’ of Imperial China and the Age of Empire”, *History Australia*, Vol. 18, No. 2, 2021, pp. 314–318.

② 有关泰国派兵参加朝鲜战争的情况，参见 The War History Compilations Committee,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Forces in the Korean War*, Vol. 1, 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The Republic of Korea, 1971, pp. 483–591.

③ David K. Wyatt, *Thailand: A Short History*, 2nd E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72.

④ Noel Battye, *The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Siam, 1868–1910*, Ph.D.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1974, pp. 132–133.

⑤ [新加坡]李恒俊、[泰国]陈玉珊：《中泰现代外交关系的建立：以 20 世纪 30 年代后两国正式建交努力为中心的考察（1932—1946）》，《南洋问题研究》2014 年第 4 期，第 100–101 页。

集团上台,中泰双方于1946年签订《中暹友好条约》,但随着右翼军人集团在美西方扶持下“反共反华”,并以此巩固其合法性以及和西方的结盟关系,中泰关系在短暂回暖后就再次滑落下行轨道。

再次,从经济结构来看,中国市场难以为泰国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泰国传统经济是以“萨迪纳”制度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结构。土地国王所有、等级授田以及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得“萨迪纳”制度一方面为“王室—贵族”政治结构提供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也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发展,使得国内经济缺乏增长动力。^① 明清时期,中国是亚洲最富庶区域,不仅拥有丰富物产,而且拥有大市场,有能力为周边国家特产提供超额利润;通过“朝贡贸易”,中国能够切实满足泰国王室对经济增长的发展诉求。于是,这也就成为阿瑜陀耶王朝与曼谷王朝努力保持对华关系的重要驱动因素。

不过,随着1855年《鲍林条约》签署,西方列强接踵而至,迫使曼谷王朝订约对外通商,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王室垄断外贸的传统格局。随着泰国被纳入殖民主义的全球商贸网络,曾经被王室垄断的对华贸易比重持续下降,不再具有国家层面的政策意义。据统计,1890年泰国进口货物中,来自新加坡的占66%,来自中国香港的占29%,来自中国大陆的仅占1.5%;出口货物中,运往中国香港的占57%,运往新加坡的占34%,运往欧洲的占4%,运往中国大陆的仅占2%。^②

20世纪初,随着拉玛五世朱拉隆功改革持续深化,“萨迪纳”制度基本瓦解,从而为泰国民族工商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持续推升了对外贸易水平。不过,由于受西方殖民主义的剥削压迫,泰国对外贸易是以英国(包括亚洲殖民地)及日本等为主,对华贸易相当有限。例如,20世纪30年代中叶,泰国对华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平均比例不足2%。^③ 中泰两国都以初级产品为主的外贸结构,使得双方经贸领域互补性相当有限。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泰国在对华建交上的积极性。

最后,从社会文化结构来看,“大泰族主义”引发华人移民归化矛盾。

泰国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商贸节点,使其社会文化呈现跨区域融合的多元化特征,并深受印度文化圈与中国文化圈的双重影响。作为中国文化在泰传播的重要载体,华人移民一直在泰国传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尤其是部分华商群体更以通婚方式融入主流社会,甚至拉玛四世都公开表示拥有华人血统。

不过,随着泰国在殖民主义冲击下开启现代化转型,对于民族国家建构的主体文化诉求开始与传统多元社会文化形成显著张力,并直接作用于华人移民归化问题。拉玛六世(1910—1925年在位)提出了“民族、宗教、国王”立国三原则,^④从而将主体民族及其文化认同提上了议事日程。同时,由于中国国内的持续动荡以及交通条件的改善,20世纪初泰国的华人移民数量激增。据估算,1904年的泰国华人数量已达40万,约占泰国总人口的5%。^⑤ 为此,拉玛六世于1911年出台了《国籍法》,将在泰华人划分为归化者与未归化者,并展开有针对性的打压行动,试图借此压制华人移民尤其是华商群体的社会影响力。^⑥

① 邹启宇:《泰国的封建社会与萨迪纳制》,《世界历史》1982年第2期,第36-45页。

② [苏联]瓦·尼·烈勃里科娃:《泰国近代史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256页。

③ 余定邦、陈树森:《中泰关系史》,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72-273页。

④ *The Souvenir of the Siamese Kingdom Exhibition at Lumbini Park, B. E. 2468*, Bangkok: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Press, 1925, p. 167.

⑤ George William Skinner,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74.

⑥ Seksan Prasertkul,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hai State and Economic Change 1855-1945*, Ph.D.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1989, p. 323.

1932年泰国民主革命后,右翼军人集团登上政治舞台,在军人总理披汶领导下积极推动民族国家建构,甚至一度引发“大泰族主义”社会思潮。披汶执政期间,曾先后颁布过12份文化政令,旨在引导建构“泰人特性”的主体民族文化认同。与此同时,华人移民数量却大规模增加。据估算,20世纪中叶的泰国华人移民数量增至300万至400万。^①于是,拉玛六世时期的“排华政策”在右翼军人集团掌权后不仅得到延续,而且进一步升级。泰国右翼军人集团在华人移民归化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对中泰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三、中泰关系复苏期(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现代化道路“求同存异”

从1975年中泰建交到1999年两国率先签署《关于二十一世纪合作计划的联合声明》,中泰关系开启持续复苏的上行通道,不仅共同应对越南侵略柬埔寨引发的地缘紧张局势,有效增进了政治互信,而且随着地缘环境的改善,双边关系发展的动力也实现从安全驱动到经济牵引的切换。

从1981年起,两国外交部建立年度磋商机制,为后续合作提供制度化保障。随后,两国相继签署了涉及贸易、科技、民航、海运和投资保护等诸领域的多项协定,为经贸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其中主要包括《科技合作协定》(1978年)、《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1985年)、《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1986年)、《旅游合作协定》(1993年)、《引渡条约》(1993年)、《民商事司法协助和仲裁合作协定》(1994年)、《贸易经济和技术合作谅解备忘录》(1997年)等。此外,双方还成立泰中友好协会(1976年)以及中泰友好协会(1987年),进一步拓展旨在促进双边关系发展的更多渠道和平台。

中泰两国渐行渐近,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迸发出来的现代化发展潜力,另一方面与泰国在“跨越式”发展过程中从“军人—王室政治结构/民营化进口替代经济结构/极端保守主义社会文化结构”到“王室—军人—地方豪强政治结构/外向型产业升级经济结构/包容性社会文化结构”,再到“政商财阀—地方豪强政治结构/全面自由化经济结构/自由主义社会文化结构”的现代化道路探索密切相关。尽管在现代化道路选择上存在明显差异,但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共识,还是促成了中泰两国在“求同存异”基础上的协同共进。具体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从地缘环境来看,美国撤离东南亚为中泰凝聚“和平与发展”共识铺路。

冷战时期的阵营对抗曾严重影响中泰关系的正常发展。从1950年派兵参与朝鲜战争,到1954年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并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到1962年签署《塔纳特—腊斯克公报》进一步巩固美泰军事同盟关系,再到1964年派兵参与越南战争并为美军提供军事基地与后勤保障,泰国逐步在美国裹挟下被绑上“反共”战车,从而导致中泰关系一度陷入历史冰点。

不过,随着冷战格局和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一味地“选边站”并不完全符合泰国自主选择现代化道路的利益诉求。尼克松1969年上台后,宣布美国开始从越南撤军;践行“尼克松主义”外交政策,声称美国将不再承担保卫盟友的全部责任。1973年1月《巴黎和平协定》签署后,尼克松政府即开始着手减少在泰国的直接军事存在,削减对泰国的军事援助。^②1971年基辛格的秘密访华和次年的尼克松访华,震惊了泰国政治精英。以泰国外交部长塔纳特·科曼(Thanat Khoman, 1959—1971年任外交部长)为首的官员迫切感觉到美国不再可依赖,需要巩固东盟和扩展与中国

^① George William Skinner,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 p. 181.

^② “Limited Retrenchment in East Asia”, in Joel C. Christenson, Anthony R. Crain and Richard A. Hunt, eds., *The Decline of Détente: Elliot Richardson, James Schlesinger, and Donald Rumsfeld, 1973–1977* (Vol. VIII),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2024, pp. 1–5.

关系。为此,1969年塔纳特即成立工作组,讨论与中国建交的可能。美国东南亚政策的调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开启直接促使泰国也调整对华政策,以因应时代和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①

对于20世纪中后期的中泰两国而言,妥善化解地区冲突,推动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逐渐成为双方得以跨越制度之“异”的核心诉求之“同”。由此,中泰两国不仅合作化解了越南侵略柬埔寨的地区紧张局势,而且为不同制度国家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开辟了新路径。作为建交后首位出访泰国的中国高层领导人,邓小平于20世纪80年代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而作为1976年政变后上台的泰国首位民选总理差猜·春哈旺(1988—1991年任总理)也于同一时期提出“变印支战场为商场”政策。这一共识为中泰两国在后冷战时期从安全驱动到经济牵引的合作动力切换,创造了积极有利条件。

其次,从政治结构来看,军人影响力下降改变泰国对华关系着眼点。

从20世纪50年代末沙立·他那叻(Sarit Thanarat, 1959—1963年任总理)政变上台,到1973年“10·14”民主运动推翻他依(Thanom Kittikachorn, 1963—1973年任总理)军政府,右翼军人集团在泰国政治结构中一直处于权力主导地位。由于缺乏民选体制的合法性授权,军人集团除了以武力相威胁之外,也在积极拓宽执政正当性,包括依托美西方的援助与投资打“经济牌”,构建“泰式民主”打“文化牌”,以及强调外部威胁打“安全牌”。于是,作为拥有超大体量的不同制度近邻,中国也就成为了泰国军人集团构建“外部威胁”话语表达的当然目标,并在美西方冷战话语的叙事加持下得到进一步强化。

1973年到1976年的“三年民主实验”虽然未能彻底瓦解军人集团的政治影响力,但为包括地方豪强、政商财阀、城市中产阶级等在内的各派势力登上政治舞台铺平道路,从而开启了80年代的“半民主时期”,以及1992年“五月流血”民主运动后的“民主化时期”。随着军人集团影响力下降,泰国对华关系的着眼点也持续转移,不仅在安全领域从“对抗”转向“协作”,而且关注重点也从安全领域更多转向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以满足各派势力在对外关系中涉及的不同利益诉求。泰国政治结构的多元化转型,从根本上为中泰关系改善扫清了障碍,有效提升了双边政治互信水平,并为两国间的经济与社会文化积极互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再次,从经济结构来看,中国改革开放拓展双边经贸合作成长空间。

20世纪中后期,泰国在经济领域先后进行了3次关键性的道路选择,从而有效推动了经济结构转型,促使泰国从传统农业国以“跨越式”发展成长为新兴工业化国家。^② 20世纪60年代,泰国右翼军人集团以“选边站”方式获取了美西方规模庞大的援助、贷款与投资,^③从而为其贯彻落实“民营化进口替代道路”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改变了此前披汶(Luang Phibul Songkhram, 1938—1944年和1948—1957年任总理)时期的“国营工业化道路”。

不过,泰国在经历20世纪60年代中前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后,国内市场规模有限问题日益突出,开始导致经济增长后继乏力,而同期国内劳动力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也迫切要求更有效利用劳动力优势的发展道路。于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泰国开启“外向型产业升级道路”的新一轮转型,并取得显著成效。据统计,从1960年到1970年,泰国出口总额仅从86.14亿泰铢增至147.72亿泰铢,年均增幅5.6%;而从1970年到1980年,出口总额则猛增至1,331.97亿泰铢,年均增幅高

^① 李一平、罗文春:《转型时期的外交:1975年的中泰关系》,《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34—35页。

^② 周方治:《20世纪中后期以来泰国发展模式变革的进程、路径与前景》,《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5期,第16—24页。

^③ David K. Wyatt, *Thailand: A Short History*, pp. 274—275.

达 24.6%，从而为泰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的牵引力。^①

对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泰国而言，如何开拓新的海外市场始终是重要的战略目标，而 1978 年中国改革开放后所迸发的社会经济活力与市场潜力，毫无疑问对泰国充满吸引力。据统计，从中泰建交前夕的 1974 年到冷战结束前夕的 1989 年，中泰双边贸易总额从 339 万美元增至 8.84 亿美元，年均增幅 17.4%；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 1977 年至 1980 年，贸易总额更是从 0.61 亿美元猛增到 4.51 亿美元，近乎每年翻一番。^②除了贸易之外，作为泰国保守阵营的新兴政治势力，曼谷政商财阀还积极推动对华投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正大集团，不仅率先投资中国，成为深圳首家外资企业，获得了“深外资证字 0001 号”，并且在 1979 年至 1989 年间，先后在中国大陆 17 个省市投资 27 亿美元，开设 28 个项目（公司），从而为中泰经贸合作树立了重要榜样。^③

随着冷战结束，泰国也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全面自由化”的新一轮道路转型。尽管在“脱实向虚”的金融泡沫破灭后，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率先在泰国爆发，并使得曾经的“亚洲四小虎”遭受重创，从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但 20 世纪 90 年代泰国在烈火烹油的经济繁荣形势下所拥有的开放包容与积极进取，却恰好与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再次坚定了“改革开放”道路的中国遥相呼应。江泽民主席（1999 年）、李鹏委员长（1999 年、2002 年）、胡锦涛副主席（2000 年）、朱镕基总理（2001 年）相继访问泰国。这不仅有力推动了 20 世纪末中泰经贸合作的快速发展，而且为 21 世纪初中泰经贸合作的“爆发式”增长夯实了互信与共识基础。

最后，从社会文化结构来看，“泰式民主”文化自信拥有更多包容性。

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随着沙立政变上台后提出“泰式民主”观念，右翼军人集团开始在主体民族文化认同的建构上回归本土传统文化，从而改变了披汶时期更倾向于效仿“西方化”的道路选择。^④为此，沙立着力推动了传统仪轨复兴，其中不仅包括国王主持的春耕节仪式、皇家游船巡游、敬献僧衣仪式等，而且包括早在拉玛五世朱拉隆功改革时就已废止的匍匐礼，以及在披汶时期废止的皇室用语等诸多内容。

得益于拉玛九世普密蓬国王（1946—2016 年在位）的个人魅力，特别是在持续不断的访贫问苦过程中构筑的道德典范形象，泰国保守阵营“铁三角”即军人集团、王室一保皇派、曼谷政商财阀拥有“泰式民主”锚点，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以“忠君爱国”为核心的主体民族文化。^⑤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提振了 20 世纪中后期的泰国本土文化自信。

对保守阵营而言，从传统文化中持续汲取养分，已成为其夯实主体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于是，作为泰国传统文化主要来源的中国文化，开始重新回到了主流社会视野，不再被视为民族国家建构的负面影响，而是成为主体民族文化的有益借鉴。随着建交后“双重国籍问题”与“泰共问题”的妥善解决，中泰文化交流在两国高层支持下迅速回暖。其中，泰国王室更是发挥关键性的引导作用，尤其被拉玛九世册封为“女王储”的诗琳通公主，不仅成为首位访华的泰国王室成员，而且在诗丽吉王后的指引下于 1980 年开始学习中文，并在此后 40 多年里访华多达 50 余次，成为在泰国积极传播中国文化的友好使者。对于中泰文化交流，诗琳通公主于 1981 年首次访华时就指出：“泰中

① 韩锋：《泰国经济的腾飞》，厦门：鹭江出版社，1995 年，第 115 页。

② 余定邦、陈树森：《中泰关系史》，第 367—368 页。

③ 正大集团官网，<https://www.epgroup.cn/column/%E6%AD%A3%E5%A4%A7%E4%B8%AD%E5%9B%BD-84>。

④ 周方治：《王权·威权·金权：泰国政治现代化进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83—85 页。

⑤ 金勇：《以国王为元首的民主制：当代“泰式民主”的文化建构》，《东南亚研究》2018 年第 2 期，第 100—103 页。

两国关系密切友好,因为我们都是东方人,有着许多共同的传统和感知。”^①

四、中泰关系全面深化期(21世纪以来):共建“命运共同体”发展道路

从2001年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就推进中泰战略性合作达成共识开始,中泰关系步入全面深化阶段。胡锦涛主席(2003年)、温家宝总理(2003年、2009年、2012年)、吴邦国委员长(2010年)、习近平主席(时任国家副主席,2011年)、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2012年)、李克强总理(2013年、2014年、2019年)、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2015年)等中国领导人先后访泰或赴泰出席会议。泰国王室成员、历任总理、国会主席以及军队领导人亦多次访华。2022年,习近平主席赴泰国曼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29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访问泰国。期间,中泰两国政府明确提出了“中泰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目标。得益于高层密切交往的政治互信,中泰双方在贸易、投资、旅游、军事安全、非传统安全、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合作都取得可持续的深化发展。

首先,从地缘环境来看,中国肩负起维护地区安定与繁荣的大国责任。

21世纪以来,随着综合国力持续提升,中国开始肩负起越来越多的大国责任,成为维护地区安定与繁荣的重要基石。从次区域的澜湄合作,到区域的“10+1”与“10+3”合作,再到跨区域的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机制、亚洲合作对话等多边平台,中国都在发挥日益增长的重要作用。这不仅为中泰关系提供了更良好的发展环境,而且也为中泰合作开拓了更广阔的成长空间。

对泰国而言,全面深化对华关系,将有助于其依托中国式现代化的外溢效应,妥善应对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传统/非传统安全风险,从而为三大结构“再平衡”提供保障(见图1)。于是,从2001年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就推进中泰战略性合作达成共识,到2012年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再到2022年发表《关于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中泰双方除了经贸合作领域成效斐然之外,包括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司法、军事等在内的其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是硕果累累。

为此,两国先后签署《文化合作协定》(2001年)、《刑事司法协助条约》(2003年)、《关于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历和学位的协定》(2007年)、《教育合作协议》(2009年),等等。2025年2月泰国佩通坦总理访华期间,双方更是相继签署了多达14份合作谅解备忘录,其内容涉及经济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海关便利化和农产品市场准入、核技术、月球探测、绿色发展、邮政、新闻媒体等诸多领域。^②

值得注意的是,泰国作为美国军事盟友,在安全领域却表现出积极的对华合作立场,开展了一些新的合作。2001年6月,中方接受泰国总理建议,同意举行中泰年度国防会谈,并于同年12月举行了首次会谈。此后,中泰两国国防会谈每年举行,并且就“相互观摩军事演习”“恢复对泰国军备出售”“进行军事教育交流”和“举行联合训练和军事演习”等方面达成一致。2022年,两国签署《中泰国防合作共同愿景声明》,进一步强化了战略沟通。在新世纪,中泰两国先后开启“打击”陆军联演(2007)、“蓝色打击”海军联演(2010)、“猎鹰打击”空军联演(2015)和“联合·突击”特种部队联演(2019)。与此同时,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也持续拓展。无论2004年印度洋海啸,还是2011年泰国特大洪灾,抑或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中国都成为泰国应对安全风

^① 《走遍中国大地的泰国公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22年8月24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qtzt/zggcdwjjw100ggs/jszgdzgz/202208/t20220824_10750624.shtml。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国王国政府关于面向未来、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进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5年2月9日,第4版。

险的重要外援。^①

其次,从政治结构来看,泰国保革双方皆秉持对华友好的战略共识。

随着曾被誉为“民主里程碑”的《1997年宪法》颁行,泰国于20世纪90年代末开启了新一轮政治结构转型,试图从根本上改变20世纪90年代在地方豪强势力主导下的政坛乱象。作为新兴资本集团代表的他信派系在2001年大选中强势崛起,从而取代了地方豪强势力的政治主导地位,但并未形成城市中产阶级在起草《1997年宪法》时所设想的“权力制衡”政治结构,而是在新兴资本集团与农民群体的“资本+选票”联盟影响下,形成了他信派系的“权力垄断”,并由此引发了保守阵营“铁三角”的强烈不满与强硬抵制。

从2005年保守阵营发动“反他信”运动开始,到2023年保守阵营与他信派系握手言和组建联合政府,保革分歧引发了泰国长达18年的政局动荡,不仅造成了“红衫军/挺他信”与“黄衫军/反他信”两大阵营的多次大规模街头运动与流血冲突,而且导致了2006年与2014年的两场军事政变,以及宪法法院判决罢免总理、解散政党、禁止国会议员从政的多次“司法干政”,从而严重影响了21世纪初叶的泰国政治生态。^②

然而,尽管泰国政治主导权在保革之间多次易手,但是中泰关系始终保持着“稳定性和确定性”。^③无论是前总理他信,还是他信派系的历任总理,诸如他信密友沙马、他信妹夫颂猜、他信妹妹英拉、英拉密友赛塔、他信女儿佩通坦,抑或是保守阵营的历任总理,诸如保守派民主党主席阿披实及军人领袖巴育,都在对华友好上秉持高度一致的战略共识。中泰两国更是分别在英拉时期和巴育时期,先后确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共建“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目标。究其原因,一是21世纪以来中国快速崛起对全球和周边地区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二是泰国保革双方虽然存在诸多分歧,但都需要对华合作的红利为各自的政治基本盘提供支撑。

对于他信派系而言,通过拓展海外市场和吸引外商投资以推动经济增长,从而满足新兴资本集团的利益诉求,并在此基础上落实“草根政策”以满足中下层农民群体的利益诉求,始终是其有效维系“资本+选票”联盟的根基所在。但无论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上台的他信,还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上台的英拉,抑或新冠疫情后上台的佩通坦,泰国所面临的都是国内经济复苏乏力、美西方经济又难以借力的内外交迫的困境。于是,搭乘中国经济“顺风车”,也就成为他信派系一以贯之的战略基石。他信当选总理后,率先于2003年与中国签订《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从“早期收获”方案下加速取消关税的协议(中泰果蔬零关税协议)开始,他信派系历任总理就始终站在推动中泰经贸合作的最前沿。

区别于他信派系主要以经贸为着眼点,保守阵营“铁三角”在对华合作方面还存在明显的意识形态诉求。冷战结束后,泰国保守阵营奉行“泰式民主”与美西方主张“西式民主”之间的结构性裂痕日益明显,并在2014年巴育政变上台后严重恶化。美国对泰施压,试图干涉其国内政局走势。2015年初,美国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素(Daniel Russell)甚至在访泰期间发表演讲,公开批评巴育政府。^④与此相对,中国却秉持“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并始终相信泰国人民有能力

① 宋清润、田霖:《利益、认知的耦合与泰国长期对华友好合作政策》,《东南亚研究》2022年第1期,第116-117页。

② 周方治:《泰国政党政治重返“泰式民主”的路径、动因与前景》,《东南亚研究》2019年第2期,第1-28页。

③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佩通坦》,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25年2月6日,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2/content_7002469.htm。

④ “Remarks of Assistant Secretary Daniel Russel”, Institute of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Bangkok, Thailand, January 26, 2015, <https://th.usembassy.gov/remarks-of-assistant-secretary-daniel-russel/>。

也有智慧解决政治分歧。这就为保守阵营提供了依托中泰合作,对冲美西方意识形态施压,从而拓展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回旋空间。对此,美国亚洲基金会曾在报告中深感担忧,认为“泰国政策制定者正在受到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影响和吸引”,从而在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上日益远离美国的传统影响。^①

再次,从经济结构来看,中国经济“顺风车”为泰国提供增长动力。

基于对 20 世纪 90 年代“全面自由化”经济道路失败的深刻反思,泰国新兴资本集团与保守阵营分别提出了“他信经济”^②与“充足经济”^③的道路选择方案,并一度成为保革双方的矛盾焦点。不过,尽管保守阵营在掌权后将拉玛九世提出的“充足经济”理念写入了宪法,在经济政策制定与落实过程中,为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还是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他信派系“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核心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国家 20 年发展战略规划”“工业 4.0”“经济走廊建设”“生物、循环、绿色(BCG)新经济模式”等发展共识。这就为中泰经贸合作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体制机制保证。中国明确支持泰国的上述发展理念和规划,将其纳入两国合作的重点、优先领域。近两年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都体现了这种发展共识,例如,中国强调支持泰国的“东部经济走廊”建设和“生物循环绿色经济模式”,^④“双方将继续深化促进经济韧性、高质量发展、清洁能源、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等领域合作”。^⑤

从商品贸易来看,中泰贸易总额在 1998 年至 2012 年间连续翻了 4 番,从 35.7 亿美元猛增到 639.9 亿美元。2013 年,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泰国最大贸易伙伴,并自此保持最大贸易伙伴地位。2024 年,中泰贸易总额已增至 1,158.5 亿美元,占泰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高达 19.6%,相较于 1998 年增长了近 6 倍。^⑥近年来,随着跨境电商与物流蓬勃发展,中泰贸易开始获得新的增长动力。

从服务贸易来看,旅游业作为泰国经济支柱产业,逐渐成为中泰经贸合作的重点领域。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居民收入增加和消费能力增强,海外旅游开始日益普遍,而泰国则成为重要受益者。2012 年,中国赴泰游客超过 270 万人次,首次成为泰国最大海外客源国,并自此保持着最大海外客源国地位直到新冠疫情爆发。^⑦2019 年,中国赴泰游客曾一度超过 1100 万人次,占泰国海外游客总数的近 1/3。虽然在新冠疫情期间,泰国旅游业受到重创,2022 年中国赴泰游客甚至不足 30 万人次,但在疫情结束后,中国赴泰旅游呈现较快复苏势头。2023 年,中国赴泰游客增至 270 万人次,而 2024 年在中泰互免签证的政策利好推动下,更进一步增至 670 万人次,中国再次成为泰国最大海外客源国。^⑧

① “The Future of Thai-U.S. Relations: Views of Thai and American Leaders o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nd Ways Forward”, White Paper, Project to Strengthen Relations between Thai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Asia Foundation, August 2018, p. 21.

② 李峰:《他信经济学及其对后他信时代泰国经济政策的影响》,《南洋问题研究》2009 年第 4 期,第 34-40 页。

③ 周方治:《全球化进程中泰国的发展道路选择——“充足经济”哲学的理论、实践与借鉴》,《东南亚研究》2008 年第 6 期,第 37-39 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泰国王国关于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2 年 11 月 20 日,第 2 版。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国王国政府关于面向未来、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进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联合声明(全文)》,《人民日报》2025 年 2 月 9 日,第 4 版。

⑥ 数据来源:泰国(中央)银行网站,<https://www.bot.or.th/en/statistics/external-sector.html>。

⑦ 《中国成泰国最大游客来源国》,人民网,2013 年 1 月 29 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3/0129/c1002-20359132.html>。

⑧ 数据来源:世界旅游观光协会(World Travel & Tourism Council)数据库,<https://wtcc.org/Research/Economic-Impact/Data-Gateway>。

从投资来看,21世纪以来泰国对华投资虽然还在持续增加,但投资力度已明显放缓,其对华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比重从2007年的11.58%逐年降至2023年的2.39%;^①与此相对,中国对泰投资却方兴未艾,正处于高速增长期。2009年以前,中国对泰直接投资占外国对泰直接投资比重还不到0.5%,但随着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东升西降”之势日趋明显,尤其是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国对泰投资逐年上升,其直接投资头寸占比也从2012年的1.45%稳步增至2023年的5.17%。^②

虽然在对泰直接投资头寸占比方面,中国与长期深耕泰国的美西方相比还有明显差距,其中仅日本的投资占比就高达1/3,但对泰国而言,中国持续增长的投资不仅是全球经济衰退下的重要“活水”,而且其投资中所蕴含的新质生产力要素,更是推动泰国产业结构升级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效应对老龄化困境的重要因素。为此,2024年泰国佩通坦总理在其施政报告中明确将新能源车、光伏新能源、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作为招商引资的重点方向。^③近年来,随着华为、中兴、比亚迪、长城、天合光能、阿里巴巴等诸多企业在泰投资项目相继落地,中泰两国开始在新质生产力领域形成更紧密的产融合作,并为地区产业链供应链重组树立了成功样板。^④

最后,从社会文化结构来看,文化互鉴为重塑“泰式民主”注入活力。

2016年,拉玛九世普密蓬国王驾崩。尽管拉玛十世哇集拉隆功国王在保守阵营支持下顺利继位,从而保持了政局稳定,但由于在人格魅力上与先王有所差异,因此未能有效填补拉玛九世留下的巨大社会影响力真空,并使得“泰式民主”失去了具现化的文化共识锚点,导致主体民族文化开始在美西方文化侵蚀下出现“漂移”甚至“异化”。

对泰国保守阵营而言,重塑“泰式民主”是巩固社会文化结构,从而为现代化道路框定前进方向的关键所在,但在失去拉玛九世的传统文化锚点后,曾在过去半个世纪行之有效的诸多运作手法逐渐难以引发社会共鸣,甚至是作为泰国传统文化底色的上座部佛教信仰,也开始面临严重危机。^⑤更为棘手的是,长期以来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尤其旅游业高度繁荣,已使得泰国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从而很难再以“闭关锁国”方式抵御美西方话语权影响。2024年,尽管与传统文化存在分歧,但泰国还是通过立法成为首个承认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东南亚国家。^⑥

于是,为了在保持社会文化开放与包容前提下,有序重塑“泰式民主”,泰国保守阵营采取了两方面的重要举措。一方面,泰国致力于加强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交流与互鉴,从而对冲美西方文化的负面影响。从2006年设立首家孔子学院以来,泰国迄今已拥有17家孔子学院和11家孔子课堂,成为亚洲设立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最密集的国家之一。^⑦目前,泰国已有2000多所中小学校开设汉语课程,在校学习中文人数超过100万。^⑧

另一方面,泰国谋求加强本土传统文化“再发现”,借以提振文化自信。随着他信派系与保守阵营的政治和解,前者更是进一步提出面向全球展现泰国传统文化的“软实力”战略构想,这成为

① 数据来源:泰国(中央)银行网站,<https://www.bot.or.th/en/statistics/external-sector.html>。

② 数据来源:泰国(中央)银行网站,<https://www.bot.or.th/en/statistics/external-sector.html>。

③ คำแถลงนโยบายของคณะรัฐมนตรี(施政报告)นางสาวแพทองธาร ชินวัตร 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 แถลงต่อรัฐสภา(泰国总理佩通坦·西那瓦女士向议会发表声明)๑๒ ก.ย. ๒๕๖๗(2024年9月12日)เล่ม ๑๔๑ ตอนพิเศษ ๒๕๑ ง หน้า ๗(第141卷,第251期特刊,第7页)。

④ 王思成:《在泰中企:推动“中泰一家亲”更加深入人心》,《光明日报》2024年11月1日,第12版。

⑤ 余海秋:《从法身寺事件管窥泰国之宗教与政治》,《世界知识》2017年第7期,第22-23页。

⑥ 《东南亚第一亚洲第三 泰国同性婚姻合法化》,《联合早报》2024年6月18日,<https://www.zaobao.com/news/sea/story20240618-3945177>。

⑦ 数据来源:孔子学院网站,<https://ci.cn/qqwl?labelId=C-Asia>。

⑧ 付志刚:《泰国成立孔子学院(课堂)发展联盟》,《光明日报》2021年10月9日,第8版。

佩通坦总理上台后的关键施政目标。^① 2023 年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后,通过文化交流互鉴“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②的重要表述在泰国主流社会引发强烈反响,并得到泰国政府的积极回应,^③从而为中泰文化交流互鉴指明新方向,开拓新天地。

结 语

19 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中泰两国相继开启现代化进程,双边关系在彼此不同的现代化道路选择影响下,曾一度经历百余年的震荡下行趋势,并在冷战前期陷入历史冰点。不过,得益于中泰两国在现代化道路选择过程中具有的自主性、进取性与本土性的内在相似特征,双方在“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文化结构”再平衡过程中,顺应“和平与发展”时代潮流,立足“求同存异”共识,从冷战中后期开始渐行渐近,逐渐从分歧走向协同,并在 1975 年建交后,促成双边关系 U 型反转,开始从复苏到全面深化的持续上行进程。21 世纪以来,中泰关系更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澎湃动力牵引下,共克时艰,共享发展,构建了政治互信、经济互利、社会文化互鉴的积极有利环境。时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泰关系也在“中泰友谊金色 50 年”之际登上历史新高地,开始面向“中泰命运共同体”,携手开拓更具挑战性的后发国家现代化新境界。随着中泰战略合作的稳步落实,绵延两千多年的传统友好关系将在新时期获得不断向前发展的持久动力。

[责任编辑:晨 曦]

China–Thailand Diplomatic Relations of Fifty Years: Modernization’s Driving Forces for a Centurial Partnership

ZHOU Fangye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Abstract: In the past half century, China–Thailand relations have not only reversed the downward trend of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but also hit new highs 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 upward movement, and further opened a new stage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he U–turn in China–Thailand relations is largely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two sides have followed the trend of the times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and based on the consensus of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in the process of choosing the modernization path of rebalancing “political structure–economic structure–social and cultural structure”, overcoming difficulties together, sharing development, and building a cooperative environment of political mutual trust, economic mutual benefit,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mutual learning. At a time of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China–Thailand relations have also stood at a new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and have begun to work together to open up a more challenging new realm of modernization for latecomer countries.

Key words: China–Thailand relations,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path to modernization

① คำแถลงนโยบายของคณะรัฐมนตรี(施政报告)นางสาวแพทองธาร ชินวัตร 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 แถลงต่อรัฐสภา(泰国总理佩通坦·西那瓦女士向议会发表声明)๑๒ ก.ย. ๒๕๖๗(2024 年 9 月 12 日)เล่ม ๑๔๑ ตอนพิเศษ ๒๕๑ ง หน้า ๗(第 141 卷,第 251 期特刊,第 7 页)。

②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当代世界》2023 年第 4 期,第 7 页。

③ 《王毅同泰国副总理兼外长敦举行会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23 年 8 月 19 日, https://www.mfa.gov.cn/web/wjzbhd/202308/t20230819_11129180.shtml。